

新時代基礎教育的轉化:路向與方位的考慮

阮衛華 倪紹強

教育事業不應是築於真空中的象牙塔。教育的概念，必須反映及針對時代的特質。吳俊升(1993)指出教育的內涵，實隨時代而改變，亦可被看成當時主導思潮的反射。Doll (1993) 卻指出，一個時代的思維範式，會受到科學、物質、文化等發展的影響。範式的改變，也要求教育工作者，作出同步的修改。筆者相信教育路向的可取性，實也取決於它能否與時代要求吻合。

啓蒙時代的出現，標誌了人類嘗試以理性思維征服大自然、以科學理論代替天命之說的空前局面。這精神帶來了十八世紀末的工業革命，也為以大規模工業生產為經濟支柱的現代世紀奠定了基石。在工業時期中，大規模的公營教育系統出現，工廠生產要求大量有紀律，能讀、寫、聽、說的勞工。普及基礎教育滿足了這社會需求。這時代中的學校教育，也反映了工業生產的特質，其中包括大班化教學、特別著重守時、守規和服從性的校風、標準化的教法和統一的答案等。此外，透過嚴峻的篩選，考試成績卓越的學生，亦會獲得稀有的大專學位，及可觀的社會地位及經濟回報。這有限的社會階級流動，也強化了物質生活改善所帶來的社會穩定。

惟從二次大戰後至二十世紀末的幾十年間，人類的經濟上和文化上的轉變，因為高速運輸、電腦和互聯網的發展不斷加速。學者指出我們實已存活於一個嶄新的年代。這所謂「後工業時期」或「後現代」，是一個史無前例、充滿不穩定性和挑戰的新時代。要分析這新時代要求教育路線如何改變，我們便要先知道這新時代的特質。

根據張文軍 (1999) 及 Morrison (1998) 等的分析，後工業時期(或後現代)的主要特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 首先，就經濟活動而言，第三產業成為了經濟體系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產業本身也隨著時間急促轉型，高產值、高知識需求的所謂高新行業(如金融、資訊等)，正取替了傳統個人服務行業的地位。知識型經濟的確立，日趨明顯，生產上要求的，是高度的知識和技術掌握。
- 由於交通及訊息流轉加速，生產及消費沒有了疆界的規限，資金、人力、貨品大量跨境流動。這促成了全球化的經濟發展。生產和消費，漸漸衝破了地域的限制。跨國企業舉目皆是，全球化的規劃及國際化的標準續漸出現。跨

境消費，亦成爲生活上的常規。由於生產能力的不斷提昇，以生產者爲中心，以供應爲主導的情況已成過去。企業以追隨消費者喜好及控制成本，作爲生存之道。資訊及電腦的廣泛應用，使管理效率向上突破，存貨需要下降，企業規模得以收縮。

- 就職業制度及組織而言，終身制、長約制，面臨瓦解。企業對人力需求的下降，使勞工面對嚴峻的就業問題。工作人口要面對不斷轉職和轉業的現實和困難。以美國爲例，成年人的工作生涯，便平均要經過三次或更多的職業轉向。向以終生聘任出名的日本，亦被迫改聘合約工。
- 經濟和就業上的改變，亦助長了文化的轉型。傳統的中上階級精緻文化，與日漸流行的通俗文化並立，甚或作出妥協和融合。歷史及傳統，漸失去了權威性，並漸被衝擊和質疑。多元化的論說，成爲了認知的主流。此外，知識的增長，正不斷以幾何級數的速度增長，舊有的認知理解和解決問題方法，迅速地被新的一套取代和淘汰。

面向這新時代，教育工作便必須轉型，並以培養出視野廣闊、靈活度高、智慧型的新一代爲宗旨。

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教授，就新教育的取向問題作出了精要的見解。在聖公會刊物《春雨》中，陳教授提到，新世紀的教育便是要以培養學生的 A, B 和 C 爲本位。其中 A 代表 Adaptability (應變能力); B 代表 Brain Power(思考能力); C 便是 Creativity (創新能力)。筆者相信，這見解正正回應了後工業時期社會狀況改變所帶來的衝擊，實值得教育工作者借鑑。陳教授對教育要培養知識廣、眼界闊的通才，及其對教育過早分流的批評，也值得深思。

英國的前教育大臣 David Blunkett，在一九九八年一篇名爲「學習年代：新英國的文藝復興」（The Learning Age: a renaissance for a new Britain）的教育政策文件作出了以下的論述：

「我們正處於新世代的邊陲。習以爲常和處理事物之舊方法正逐漸消失。工作性質及其所需技能要轉變至明日世界的需要 ... 要適應急速改變，我們必須回到終生學習去。我們不可以依賴一小撮的精英份子 -- 我們需要所有人都有創意、企業精神和學習風尚。」

筆者認爲此論述中最重要、亦是最精要的部份，莫過於肯定了素質教育的對

象為所有人，而非一小撮所謂精英的小眾。我們細想，在這貧富日趨懸殊的新時代，若教育質素的改善只能惠及小眾，而大部份人則被攆出局外，甚或淪於貧窮失業的境地，社會整體利益實何存？此外，大量人陷於失業及無望的境地，倒過來也將成為社會動盪的源頭。

若全民藉著教育獲得提昇是肯定的目標，學校教育可作出甚麼動作去落實呢？筆者相信傳統的教育以校園為界、教室為本，並以汲取課本上的資料為限的格局，已然過時失效。相反，學校應透過靈活的安排，盡量調動資源，全方位的對學生提供學習和思考提昇的機會，並予以有力的支援。此外，教育成效的計算，應以重質多於重量為本。高思維的發展、自信心的增強、眼界的擴展，實比能唸多少篇文章、能拿多少分數來得重要。

其實隨著時代的轉變，香港學校當局(包括校董會、校長和教師)以至家長們都意識到改變的需要。無論在教導與學習的層面，或是學校政策管理的層面，都因時制宜的作出相應變化。這些的變化包括廣泛運用學校以外的資源、跳出學校環境的框框；或是以多元化以至大膽創新的嘗試，以引入新動向；又或是從教育科研之理論再結合成實際可行的實踐方案。以下，筆者將嘗試列舉幾間中小學所曾推行的措施和取向，並從中分析可供借鏡的地方。

例子一：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 高思維訓練計劃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於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一年間，進行了一個為期三年的高思維訓練計劃，分別在中國語文科、公民教育科、歷史科及綜合科學科等四個學科試行。這計劃著意將教授思考技巧的訓練融入學科之中，並以校本課程為基礎，由該校相關的教師將課程重新規劃和開發。

所謂高思維能力的訓練，則包括批判思考、創意思維、解難能力及決策技巧等等。而這些能力則在課程內的學科中教授及演練。老師們著意發展和研製自己所用的課程素材以及學習活動等。此外，也要研發用以量度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項目和機制，並收集用以量度學生和老師對該計劃的檢討資料。老師們意識到，當他們不再需要學生只提供封閉而資料性的答案時，學生就開始學會蒐集、定位、演繹、分析和評鑑資料的竅門。高思維訓練計劃實在是開展有效能的教與學的起點。學生能夠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及檢視每一個事件或難題，並作出自己的判斷和決定。學生又變得較有反應、富創意、有想像力，並且對相關的事物產生濃厚的興趣。學生們在課堂中傾向更願意討論、分享和匯報。學習態度是大大提升了的。因應著更多的討論、匯報，並揚棄指定答案，他們覺得學習更有幫助。其中透過資料之比較和分析，並藉著討論、辯論、匯報，天馬行空的想像和聯繫，

從實踐中學習。他們充份掌握到成績評核的方式和準則是多元化的，而不再只侷限於刻板的紙筆練習(註一)。

此項計劃用意在於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可以說是結合現代科研成果於現實課堂之中，將專家學者有關學習的研究所得，加以充分理解和消化之後，用以調校教學和學習的方式。該計劃也曾邀請了外間學者緊密的協助，但是主要的工作還是由校內老師負責，以校本為基礎，逐步的研究開發適合自己學生需要的課程。這計劃又是與時並進和具針對性的，看穿了學生對學習死記硬背的傾向，改以靈活多變的學習模式，提升學生的思維訓練和學習動機。

例子二：庇理羅士中學 – 交流計劃

該校為一間頗具歷史的官立女子中學，近年著力推行多方的增進計劃，其中一項便是交流計劃。這計劃又可分為本港和海外兩部分。學校曾經選派出多位同學到另一間男校上課，為期一段時間。另一方面，學校又接待同一男校的若干名學生到該校上堂，作為交換生。作為交換生的同學們自是能夠體驗到兩所學校的不同文化和教學方法，以至學習氣氛等等，並企望能從中獲益。

此外，交流計劃還包括到新加坡的中學來進行。由於到新加坡生活和上課是沒有老師陪同的，前赴當地的學生更要培養出自立和自律的精神，在學習和對比兩地文化之餘，更要鍛鍊出獨立的能力。這經驗也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此計劃的目的，自是希望讓學生能夠跳出自身之框框，體驗不同環境而訓練出獨立能力。有機會投身交流計劃的當然是得益最多者。筆者有機會在一次研討會中聆聽該校的老師和參與同學之介紹和分享，其中對同學之表現甚為欣賞。只見她們有條不紊的將一些經歷娓娓道來，還精簡扼要的比較了香港和新加坡兩地之特色和優劣之處，甚有見地和顯出大將之風。此外，其他留校的同學也可學會如何與不同背景的同學相處，也是一種學習。

例子三：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 家長做後援

位於粉嶺的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開校的時間並不長，就是在此資源緊絀的情況下，卻積極的動員家長作為義工。家長們可以因應其專長充當游泳教練、武術教練等工作；當學校老師要領隊進行參觀之時，家長們也可以作為後勤部隊來參與協助。該校又開辦各類課程，如親子閱讀班、資訊科技教學及德育輔導等，讓家長了解最新教學形勢及親子教育法，並向家長解釋學校教育的理念。部分家

長不諱言學校是家長的聚腳點，留校當義工，一方面可以消磨時間，同時又可以多接近子女。誠如該校的校長相信，只有家長與學校目標一致，才能凝聚力量。他認為家長與學校應該是說夥伴關係，今後合作並不是要求家長一面倒為學校付出，學校也不是要求家長只提供廉價勞工(註二)。

學校開始感受到家長在推進學校活動的助力。相對教師而言，家長們因其人數眾多，可供動用的時間資源也相對的多。而家長之中，不乏具有專長和特殊技能者，可以為學校作出貢獻。若學校當局與家長之間維繫著良好的夥伴關係，又有合宜的溝通，再加上學校提供適當的培訓，實在會為各方帶來益處。同輩家長之間也可以互相支持和學習，自己也得以成長。

例子四：天主教聖芳濟中學 – 以歸屬感推動學習

位於九龍大角咀的聖芳濟中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天主教中學。它由天主教的修士創立，一直以來，校風和成績良好。學校除於課堂中悉心教導學生外，更掌握了每個與學生在課堂以外接觸的機會，對之循循善誘，使學生成器。小息、午飯時段及放學之後，學生和老師便打成一片，或談學問，或談生活和思考問題。學生得到啟蒙，往往便是此等時間出現。為了使學生對學校增加歸屬感，並有更多的機會和時間得到老師的啟發，學校實行了開放校園政策。學生可於假日和週末，回校讀書和作有益身心的活動，其中包括了師生間的交誼活動和球賽等。這做法正正增加了師生的接觸面，並改善了師生關係和學生學習的機會。換句話說，當學生能對學校產生感情，學生對學習的看法和動力，亦必然得到改善。終身學習的性向，起點往往便是產生於對學校生活的美好回憶。這方面，聖芳濟可說是成功的例子。

此外，學校亦有頗為積極的校友會組織。校友會的活動，加強了學生認同學校與自己的關係，而且是終身的。學生於是便更能投入學校的學習生活之中。此外，部份舊生，更自發的回校，以過來人的角度，幫助師弟們功課上的問題。我們實可從聖芳濟一例中，得到啟示。只要學校悉心辦學，老師以誠意教導學生，師生接觸面得以擴闊，學生發展的動力和空間便能全面提昇。

例子五：油麻地街坊會小學 – 從學校生活中學會多元文化共融

油麻地街坊會學校是本地津貼小學，以前全部是本地學生，校董會有感於區內中下層的南亞裔兒童小朋友愈來愈多，卻沒有機會上學，遂自九九年起開始取錄這些學生。學校以「培養學生尊重不同種族、階層及文化」為學校特色。可

以說該校是小型「聯合國」。學生國籍、背景不同，有菲律賓及南亞裔，也有從各地回流的香港學生及內地新移民。該校三百六十名學生中，五成五入讀英文班，中文班則以內地新移民為主。由於語言不同，平日上課分為中文班及英文班，但學校透過不同課外活動，例如手工藝、民族舞蹈等，讓學生學習不同文化。為了迎合學生來自不同背景的需要，學校除了要相應作出雙語教學的安排，在行政安排上，學校對不同種族的習俗或生活習慣也要作一定程度「讓步」。例如有些伊斯蘭教的學生或印度女生不可穿裙子或短褲，只可穿長褲。巴基斯坦的新年在四月，他們也會按家長要求，酌情讓學生放假幾天(註三)。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因時制宜的做法，學校正看到有需求而作出適當的配合。另一方面，市區學童的數量減少，學校改以收錄未能投入其他學校的小朋友，實在是自存之道。但反過來看，這做法卻又帶了頗正面的學習效果。香港既是國際大都會，居住著不同的族群。後工業年代，也是衝破族群自閉的跨文化年代。油麻地街坊會小學的做法，正正便使學校成為跨文化社教化 (socialization) 的場地。

結論

我們大抵頗能感受到全球一體化、後現代思潮等的衝擊，為香港教育帶來的挑戰。事實上，香港已有好些學校自發地作出適應，以求與時並進。由於篇幅所限，以上的聊聊數個例子，只是香港部份學校面貌的一鱗半爪，都是筆者所曾接觸或涉獵過的。筆者希望讀者能從上述的理論介紹和學校的實例中，就新時代學校的轉型問題，得出一些可供參考的借鑑。她們有著自身不同的背景，可是都曾作出嘗試，或是進行校內課程革新，或是跳出自身的框框，或是引入和調動舊生或家長的資源，或是改變收生模式等等，以求建立本身的特色及增加學生從課內、課外不同的空間，得到學習的機會。這正正便能配合後工業時期教育的多元性。學校能盡量調動不同資源，促進質素為本教育，更是提昇教育效度的有效方法。筆者亦希望教育當局能給予更多的資源和空間，使學校能有效的為學生全方位的學習和全人的發展，作出貢獻。

註釋

註一：可參閱阮衛華、倪紹強(2003)：《透過全方位學習提升思維能力及精神健康：香港學校經驗的分享》。

註二：可參閱明報 2002.6.3

註三：可參閱明報 2002.6.24

參考資料

吳俊升(1993)。《教育哲學大綱》。台北：商務印書館。

- 阮衛華、倪紹強(2003)。透過全方位學習提升思維能力及精神健康：香港學校經驗的分享。論文發表於澳門大學「教與學的改革和創新」學術研討會，11/2003。
- 張文軍(1999)。《後現代教育》。台北：楊智文化有限公司。
- 陳坤耀(2001)。《教育改革之路：從新經濟與新科技談起》，載於聖公會學校刊物《春雨》，12/2001。
- 黃穎頤(2002.6.24)。油麻地街坊會組聯合國小學，《明報》。
- 黃穎頤(2002.6.3)。嘉福榮真小學培訓家長做後援，《明報》。
- Doll, W. E. (1993). *A post-modern perspective on curriculum*.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Press.
- Morrison, K. (1998). *Management theories for educational change*. London: Paul Chapman Publishing Ltd.
- UK Government (1998). *The Learning Age : (a renaissance for a new Britain)* .